



陈华文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也是一个认真的思考者。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十卷本）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诗歌与文艺评论。其实，散文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真性情、最能看出一个作家思想底色的文学体裁。散文集《阅读的烦恼》汇集了张炜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见解，对于我们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如何看待文学现象提供了参考。

1 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慎重提笔

《阅读的烦恼》之书名，来源于书中的同题散文，其副题是“关于二十五部作品的札记”。这篇文章成稿于1997年，当时张炜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作家了，但此时的他依然在博览群书。一般来说，阅读中有所获是心情愉悦的，文章名为《阅读的喜悦》或《阅读的收获》岂不是更好？但他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后，内心深处有隐隐的担忧和焦虑。有的作者急功近利，总想着成为一流的、有威望的作家，于是在作品的“包装”方面绞尽脑汁，希望在文坛和市场两端都讨好。张炜认为，中国有“言为心声”的传统，不能为了成名，“在作品中进行奇怪的拼接、联想、若有其事地胡说八道”。不真诚的作品，文辞越是优美，对人的毒害就越大，作为文学担起情怀的作家，张炜对这类作家和作品很是担忧，阅读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带来愉悦，还会带来无尽的烦恼，败坏文学的胃口。

作家是不是应该天天写作？张炜在书中认为，勤奋是一个作家的优良品质，但是仅有勤奋是不够的。我对此深以为然。我认识很多作家朋友，有的格外勤奋，天天写呀写，发表作品也是家常便饭，且每次发表新作都在微信朋友圈秀一秀。在社交媒体展示新作之发表并无不妥，我担心的是作为经验丰富的作家，日日写作、高频率发表并以此为乐，会影响作家对文字、对生活深度的追问和思索。写作与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是有差异的，比拼的是智识和积淀。作家不妨偶尔放慢写作的脚步，即便才情四溢、灵感迸发，也需要“停一下”，深思熟虑后再动笔写作，或许作品会出现不同的面相和格局。当今文坛，有的作家总是急急忙忙写得太快、出版得太多，但是又有多少作品，能真正经受时间的检验呢？每个作家都应该慎重提笔，文章千古事，若敷衍了文字，文学就会敷衍你。

2 文学评论需要风清气正的氛围

对于文学评论之生态，张炜也不无担忧。他在书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说有色

盲的评论家，对色彩之间的差异都分不清，却对一幅画作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他写道，“这是令人同情的”“在别人眼里，这种尴尬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消除的”。众所周知，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马车的双轮，缺一不可。现实中，一些文学评论者碍于人情和面子，对所评之作经常笔下留情，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虚话和套话，或者是一些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还有评论者更甚，对文学水准平平的作品，写一些肉麻的溢美之词，把平庸之作捧到了天际。一些普通的读者，有时会被这样的言辞所鼓动，这很正常——不正常的

是评论者。文学评论需要一个风清气正的氛围。作品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有一说一，这理应是常识，但是在文学评论中却不易实现。文学评论中的真知灼见，或者带一点刺刺的声音，都很稀有和宝贵。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创作者和评论者双向奔赴，文学作品需要真诚，文学评论也要说真话、敢于硬碰硬。否则，文学的生命力就会萎缩。

3 传记写作不仅仅是讲故事

文学写作中，各类人物传记备受作家、读者和市场的注目。优秀的人物传记，不仅仅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还对一个人的思想、追求和时代风貌，都进行多维的呈现。在本书中，张炜袒露了对优秀人物传记的偏爱。中外文学史上，有一些人物传记写作的高手，如西汉的司马迁、奥地利的茨威格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时张炜也认为，一些大部头的传记，和传主的故事相比反而无聊和单薄多了，“而实际上，他们所记述的每个传主本人几乎都令人神往”。

人物传记的写作，并不是对人物进行事无巨细的描写，更非迎合读者编造哗众取宠的情节。张炜认为：“杰出的传记作家越来越少。更多的人都忙着自己的创作，其实一个真正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更好地写出另一个人物，而这种写作又绝不会损坏或剥夺他的至为可贵的东西：天才的创造力。”

简单地讲，人物传记的写作，除了调动一切文学的手法之外，我认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需要大量的传主素材，尤其是对于著名人物传记的写作，更要寻找鲜为人知的素材。当然也不能陷入无止境搜集之中，否则这样的传记写作可能沦为一堆素材的堆砌，淹没了人物真实鲜活的一面。二是无论对哪个领域的人物传记进行写作，都要写真实的人、立体的人，即便是为成就斐然的人物进行传记写作，也要兼顾日常生活，毕竟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高地上”的人物传记只会让读者觉得不可信。三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人物传记写作中依然适用，人物传记不是简单地讲一些起承转合的故事，更要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叙述中体现人物的性情。作为读者而言，如果阅读一本人物传记之后，只是记住了几个小故事，从中不能获得触动人心的启迪，那这样的传记忽略也罢。

这些储备介入一本书的。一本好书，一定会有读者的储备里所没有的好东西，这是一本书价值的基本体现。如果在阅读时捕捉到了这些东西，即算有效的阅读。这种“捕捉到了”的状态，即“会意”之境，是主体觉醒状态下所达成的阅读效果。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说明“会意”时，读者已深陷书内，成为书中情感或故事、逻辑发展的追踪者、窥探者，收获了感动、兴奋或启发，也满足了好奇心，其本质是阅读主体在知识和经验、思想和情感上得到了延展，实现了读者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过程有个暗线：阅读达到会意之境的过程，是读者的情感、知识、经验、思想等已有储备被激活的过程。如果储备不足，就无法进入会意之境。简单说就是水平低则读不懂，主体无法活跃。读书要循序渐进，就是这个道理。

“我有发现”是阅读主体被激活的关键标志，也是阅读主体高度活跃才会有境界。这个“发现”不仅指阅读时在书中发现的不合之处或作者无意表达出的“天机”，更重要

4 对时髦事物要保持足够的清醒

当前，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出现了很多“网言网语”。有的接地气，逐渐走进严肃文学的视野，有的则全是搞怪和低俗，不能步入大雅之堂。作家如何面对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一切时髦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文坛一直争论不休。张炜认为，追求时髦和接受时髦的能力甚至会被视为一种天赋，进而又会被形容成天才、智者之类。实际上这一切与天才、智慧，与一个生命的创造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作家能快速地接受时髦的事物是一种能力，但是这并不表明作家就应该追逐时髦，反而对时髦的事物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时髦不会让文学脱胎换骨，也不可能让作品变得更加深刻。他在书中写道：“一个艺术家和思想者是不可能以贩卖和传递最时髦的术语和概念而得以生存的。相反，这往往是他变得中空、浮泛的开始。他慢慢变成了一个消息的传递者，一种场合的描述者，是从乙地到甲地的义务传播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肤浅而新奇的所谓新知识，最新的艺术方式、表达方式，往往是极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一个功力深厚的作家如果热衷于此，那就是危险的写作信号。反过来讲，一部文学作品要是以非常朴素的方式，甚至是有些传统的方式写出来，那么作品真实感人的力量就会加倍增长。而一个作家在作品中煞费苦心设计一些新颖的文学形式，最后会收获甚少，甚至会伤害文学本身。

5 诗意是衡量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作家们善于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讲述故事、表达感情、传递思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对语言的驾驭轻车熟路，作品才有出彩的可能。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被誉为“文学语言的王冠”，最为讲究语言的锤炼。张炜认为，小说家和散文家都要有一颗诗心，即便是不写诗，也要养成读诗的习惯。文学作品中的诗意，是难得的文学品质。有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如同白开水般看不到诗意，对于这样的作品，他失望地写道：“从中看不到一句诗。大白话，巧言趣语，有时连巧言趣语都算不上……多大的误解才造成了这样的写作和出版。”“诗是一步一步丧失的，而不是在一个早餐、在某一本书里失去的。”

当前，受到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影响，作家的创作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但是不管怎样求新求变，作品中如果找不到盎然的诗意，文学性就会大打折扣。当然，诗意的写作需要长期积累。说得再直接一些，作品是否具有诗意，乃衡量文学水准的一把重要标尺，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亦然。张炜是小说家，但在文学生涯中始终保持对诗歌的

的是，阅读一本好书后，主体视界大开，用与过去“旧我”不一样的格局和方法观照事物，从而发现现实问题的答案或新的问题。比如读完《红楼梦》，会对情感问题有新的领悟，或以此为参照来分析自己的情感、衡量人群的情感关系。

“我有发现”的本质是“我”的变化，也实现了人的成长。试想，读过大量的好书后，读者重构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重塑了阅读主体，更新了储备，迈上了新的阅读台阶，有了新的阅读诉求。所谓成功培养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其中要义就是他能够持续有阅读需求。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阅读的目的，就是丰富阅读主体，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培养一个真正的阅读者，其有效途径就是不断唤醒阅读主体，持续积累，使之更饱满，有更高格调，增加改造自我和世界的能力。

阅读主体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谓培养读书人其实是助之建构这个系统，而其建构的前提是阅读主体自主性的确立。当自主性

启动时，整个阅读过程是一个系统性运转的过程，充满了鉴别、发现、纳入的魅力。既然这是前提，就是原则，不要轻易逾越；作为阅读指导者最忌诱趣界，或越俎代庖，或强制喂食，都是对自主性的抑制。自主性没有启动，阅读主体就拿不到进入书中的门票，只是个旁观者而已，毫无发现可言，构建系统云云就无从谈起。可现实中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要防止轰轰烈烈的读书活动里，有大量的阅读者并没有真正“下水”，甚至连鞋子都没湿——阅读主体没有觉醒，很可能只是个撞钟的和尚。一本好书一定自带激活阅读主体的魅力。阅读指导者最重要的价值是“恰当的工具”意义，即在读者遇到“陡坡”时，提供攀登工具；遭遇“铜墙铁壁”时，提供斧凿火药。须谨记，不要替代他爬坡穿墙，少做“告知答案”的勾当。

阅读主体不断被唤醒，常有发现，长期积累，即可确立阅读习惯、阅读功力、阅读品位等阅读要素，我们就可以庆祝了——终于有了一位合格的读书人。

赤子之心，他出版过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也许正是因为经常光顾诗歌的田园，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艺术美感。

6 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灿若星河的作家作品。上千年来，中国人几乎都以文言写作，文言写作尤为讲究语言的精练，文学的形式、内容和思想完美地融为一体。在世界文学史上，文言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白话文成为文学的主要语言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张炜在书中指出，在白话文写作的今天，作家们不能摒弃中国的文学传统，要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古典文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诗歌，出版了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唐代五诗人》等。在《阅读的烦恼》一书中，张炜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敬佩之情。这几年，伴随着人们对古典文学热情的升温，“苏东坡热”突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不单由于苏东坡傲人的才气、出众的诗文书画和一路的颠沛流离，更重要的是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总是能乐观、豁达地面对人生。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之典范，苏东坡写下的千古名句，胜过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千言万语。经得起历史检阅的作品，值得反复研读，从而厚植文学底蕴、底气。

此外，对于写出文言短篇小说杰作的蒲松龄，张炜也心怀敬意。这位一心想为官的清朝秀才，终生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干脆转而埋头文学，在齐鲁大地搜集各种传说和传奇故事，最后一鼓作气写出传世之作《聊斋志异》。蒲松龄并未对搜集到的故事进行简单转述，而是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使得扑朔迷离的故事传说具有了文学性，尽管书中亮相最多的是各类鬼怪狐仙，可蒲松龄意在写人，表现人性，直指真实的现实生活。这样一来，《聊斋志异》就和其他神怪传奇分清界限。故事仅仅是故事，文学则不仅仅是故事，还有人性的刻画和揭示，这就是文学和故事之间的根本差异。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巨大的富矿，当代作家要善于开挖这座矿藏，这也考验文学的慧眼和能力。

回到《阅读的烦恼》，从广阔的视角看，阅读和写作就是孪生兄弟，作为作家而言，两者是无法分割的，你我交织，并且相互启迪。一个作家不广泛阅读是不可思议的，若阅读只是被作品牵着鼻子走，或者不求甚解，这种阅读就是假装阅读，非但无益，害处还不少。张炜所言的“阅读之烦恼”，显然是以思考者的姿态在阅读，这是一种宝贵的阅读方式，此乃阅读之佳境。作为作家，写作的节奏可以慢下来，但是阅读与思考一天都不能停步。只有知晓阅读中的各种玄机，写出的作品才会具有蓬勃的生命张力，抵达人类灵魂的深处。

（作者系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编审）

刘笑天

读张中行先生的书，曾经是世纪之交前后非常“时尚”的事，不仅限于学术界、文化界，甚至可以辐射到广义的读书人，而且影响深远。但是不过二十年，读书变化迭代竟如此之大，前一阵想网购几本他的书，却发现没有新版本，只能去旧书平台购买。张中行代表的价值取向，还有母语表达的语体、文体的原创意义就这样退居到少有人关注的位置，难免令人心生慨叹。

最早让张中行成名的是他的“负喧”系列——对红楼往事的追念，对师长友朋的缅怀。虽然文章多用春秋笔法，惯于不露声色，然而在对旧事的回忆中仍然难以掩住其内心深处

的几丝萧瑟、几点黯然。写文化名人、大师、巨匠的文章，数量那么集中，质量又如此之高，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绝响——识见之深、笔法之妙是其一，亲历者身份特有的写作角度亦是其一，而且由其文化价值、思想价值敷衍出的审美意义、语体意义也因斯人已逝而成了斯世难再的空谷之音。

因为这些文章写的是文化名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但若只是这样读张中行的文章，不仅是低估，而且是错解。对所有大师巨匠，他都是站在平视角度着笔，不但是学识上的平视，更是人格上的平视。他首先把这些名人当作“人”来抒写，其次是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刻画，而且是当作真实的“常人”来描摹，不因为是大师就神化溢美，也不因为是师长就隐去白璧微瑕。比如写胡适，对他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解聘林公铎一事，如实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公报私仇”之嫌；写梁漱溟，既大力颂赞其风骨，“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的平视，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同时又认为他的理想放在概念里更合适，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写周氏昆仲，他认为鲁迅“趋于信”，而周作人“止于疑”。其实，胡适解聘林公铎之事说法不一，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若干年并不算空想主义者，而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论者，但套用牟宗三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来说，张中行文章立论未必准确，可是却十分深刻。

张中行写人，绝不铺张扬厉，秉承辞达而已原则，然而寥寥几笔人物风神立现，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张中行记人可谓达到了这一境界。比如写朱自清，结尾不直接写其风采，却写在朱先生仙逝二十多年后，遇到了他的公子：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科也是谦恭而恳挚。那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老果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借自己与夫人对朱公子的观感，侧面写朱先生的流风余韵，看似不假雕琢，实际匠心独运，远胜某些散文作者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下笔千言而

言不及义。

其实，张中行记人最为真切

的还是那些“市井小民”，平视普通人，同样是他的基本价值倾向。虽然腹笥丰赡、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处于“小人物”状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文化人、名人自居。他写起普通人体验丰富、得心应手。《王门淑粹》记述邻居王铁珊女儿李大太的豪侠正直，《汪大娘》描写李家佣人“汪大娘”的淳朴耿介，《凌大嫂》书写凌大嫂坚守传统之礼，一生为他人默默奉献的罕见美德。张中行写他们不是站在启蒙高度，而是感同身受，同时自然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感，其文深挚朴厚，扣人心弦，回响悠远。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说张中行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一种“小民的分量”，故他写普通人自带“悲悯”，是“情感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思想模型，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极为罕见，值得珍惜与弘扬。

张中行写过《顺生论》，但并不单维突出“顺应”，他仍然强调“怀疑”；他也写过《横议集》，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他针对冯道提出自己观点，批评欧阳修、司马光的正统史观，并引发与黄裳的争论；他对吴起从人性角度提出思辨性观点，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专制机暴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虽然黄裳批评他所谈多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力道往往重于整个世界，自带锋芒与春秋笔法其实都是张氏散文的本色与风格。

张中行被誉为“杂家”。以传统作为坐标，他处世做人风格和温柔敦厚的文风属于儒家，他讲“顺生”有道家一面，他也精通佛学，编过刊物；对标西哲，他对康德、罗素哲学有独到理解；那个“沙滩红楼”的北大学子，与“五四”先哲及那个年代的各界巨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他出入其中，兼通儒释，亦中亦西，融通古今，同时又不执着于一家一论，于事于人于天，他都以自己的慧眼去观察，以自己的心灵去辩证，以自己的妙笔去呈现……他所展示出的这种现象理应深刻地渗透在文化血脉基因中，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代，我们更要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将这篇文脉、这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作者系齐南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读者观点

张圣华

在阅读指导实践中，大多情况下书目是指定的，有老师和同学共同研读的语境，还有标准化的阅读测试题目。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为培养阅读者而努力着。我们须坚信，建设书香社会的目标一定会达成，我们应时常追问：我们主观努力的兑现概率有多大？哪些阅读是有效阅读？我们也最终能培养多少真正的阅读者呢？我们有必要保持一种警惕：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如果只是被动地跟着，随波逐流，无论最后的测试能得多高的分数，都未必是有效阅读，有效阅读的积累不足，就很难成为真正的读书人。

有效阅读一定是在阅读主体觉醒的状态下实现的。这种觉醒的标志是什么？

抵达会意之境，是阅读主体觉醒的初级状态。在阅读一本书以前，阅读者都有一定的储备，如情感、知识、经验、思想等，阅读者是带着

教师荐读

劝君读读张中行